联合国 A/76/302

大 会

Distr.: General
25 August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3(b)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

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按照大会第 75/23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6/150。

21-11641 (C) 270921 041021

请回收

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第二十六和二十七届会议报告**、***

当务之急：系统性种族主义与 2021 年的机遇

摘要

在本报告中，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概述了其第二十六届和第二十七届会议的讨论情况。工作组第二十七届会议讨论了系统性种族主义和 2020 年的教训。会议总结认为，2020 年揭示了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结构性歧视，这些种族主义和歧视一直以来使非洲人后裔处于不利地位，使他们无法充分享受人权。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医疗卫生方面的种族不均，并结束执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只能通过诚实评估过去，特别是评估非洲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后果来实现。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 载有出席名单的附件可查阅 https://ohchr.org/Documents/Issues/Racism/WGEAPD/Annex_A.76.Slot2431.pdf。

一. 导言

1. 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举行了第二十六届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举行了第二十七届会议。由于发生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两届会议都以虚拟方式举行。在第二十六届会议期间，工作组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并与民间社会一连举行了五次区域协商。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主题是“当务之急：系统性种族主义与 2020 年的教训”，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的代表和特邀讨论专家参加了会议(见附件)。

2.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5/237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人权理事会通过工作组主席提交关于该工作组工作的报告。第三节和第四节概述了第二十七届会议的议事情况。第五节着重说明了通过协商进程确定的非洲人后裔的紧迫人权问题。第六节载列工作组的结论和建议。

二. 工作组开展的活动

3. 工作组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A/HRC/48/78)中详细介绍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情况。工作组谨提请大会注意该文件。

三. 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安排

A. 会议开幕

4. 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在开幕发言中呼吁采取紧急集体行动，有效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影响全世界非洲人后裔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排斥、边缘化和不公正问题。她强调，需要诚实地评估过去，以承认并解决跨大西洋贸易对非洲人造成的后果。她重申了联合国打击种族主义的承诺，这体现在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和保护少数群体网络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落实人权理事会第 43/1 号决议的工作中。她指出，《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中期审查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将种族平等和公正置于全球和国家议程的核心提供了平台，呼吁会员国履行现有义务，禁止和消除种族歧视，优先安排资源和具体行动，使这一时刻成为实现非洲人后裔人权的关键转折点。

B. 选举主席兼报告员

5. 多米妮克·戴被确认为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6. 即将离任的主席兼报告员艾哈迈德·里德感谢其他专家、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团体在其任期内给予的支持，并对新任主席兼报告员表示欢迎。

7. 戴女士赞扬即将离任的主席兼报告员，并对自己受托在对工作组任务至关重要的时刻担任这一职务表示感谢。

C. 工作安排

8. 工作组通过了第二十七届会议的议程和工作方案。

四. “当务之急：系统性种族主义与 2020 年的教训”：审议摘要

9. 工作组第二十七届会议以四个专题小组讨论的形式举行，主题为“当务之急：系统性种族主义与 2020 年的教训”。在本届会议之前，工作组发表了一份关于 COVID-19、系统性种族主义与全球抗议的专题报告(A/HRC/45/44)，实时分析了 COVID-19 大流行疫情、不断升级的执法暴力以及非洲人后裔面临的独特挑战。该报告已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10. 第一个专题小组讨论的主题是“COVID-19 是灾难和催化剂”，工作组主席首先介绍了工作组专题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报告中，工作组质疑把 COVID-19 疫情的影响、警察不受惩罚的预期以及不断升级的警察暴力作为孤立事件。相反，报告显示了系统性的关联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非洲人后裔在慢性病患者和必要工作人员中的比例过高，这与执法人员对非洲人后裔和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过多执行 COVID-19 条例和公共秩序规定相比，并不是巧合。这些多年流传下来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压迫植根于殖民主义及非洲奴隶贸易和贩运。她指出，那种认为 COVID-19 大流行是一个平等无差别地影响各社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她讨论了工作组对 COVID-19 和同时发生的警察对非洲人后裔的暴力升级这两大孪生流行现象进行的另类剖析，以此作为一种方法，来确认种族不均，并打开空间，实实在在地解决在不确定、不稳定和全球性恐惧的时刻受到纵容的种族不公和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

11. 促进健康公平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Uché Blackstock 讨论了美利坚合众国种族化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认为这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表现。她指出，美国黑人的预期寿命最短，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最高，她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黑人社区承受了最大的 COVID-19 死亡负担的各项因素，包括必要工作人员中非洲人后裔的比例过高，该群体严重依赖公共交通，难以获得检测和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以及非洲人后裔有更严重的慢性病负担。Blackstock 博士还表示关切，有证据表明医疗卫生工作者对黑人患者存在隐性偏见和负面态度，以及卫生保健系统使用的算法中存在种族主义偏见。她指出，每天生活在种族主义之下的长期压力对预期寿命和健康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并加剧了美国黑人对卫生保健系统的不信任。这些表现形式的结构性种族主义使人们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特别是获得安全适当住房、有酬职业、优质教育、健康食品和卫生保健的机会。

12. 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特拉伦•莫福肯就健康不均的根本原因——结构性种族主义发言。她讨论了非洲人后裔面对 COVID-19 的特别脆弱性，认为这是植根于歧视性做法的各种制度的直接后果，这些歧视性做法系统地按照种族界限分配资源、权力和机会。减少结构性健康不平等需要挑战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社会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均。她强调了采取多部门交叉办法开

展这一努力的重要性。特别报告员回顾说，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人权与其他人权密不可分。她还对新兴医疗卫生技术中种族主义偏见的风险提出了特别关切，强调了非洲人后裔妇女在享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方面面临的障碍，并指出全世界许多非洲人后裔面临严重污染。关于 COVID-19 大流行问题，她讨论了为医疗卫生系统增加资源并公平分配的必要性，以及各国确保 COVID-19 疫苗和治疗安全、可供、可及和可负担的义务。

13. 在互动对话期间，里德先生强调，从历史传统来看，系统性种族主义对非洲人后裔健康状况的影响植根于被奴役非洲人的营养问题和情感痛苦。在回答工作组成员 Ricardo A. Sunga III 提出的问题时，Blackstock 博士强调有必要在推出 COVID-19 疫苗时纳入种族和族裔等脆弱性标准，以确保疫苗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公平分配。一些国家可能会违反其国际义务，确保为本国公民接种疫苗而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健康权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关切。在回答里德先生和巴西代表关于数据收集的问题时，Blackstock 博士承认，应将种族因素系统地纳入健康数据收集。特别报告员补充说，按种族分列的数据至关重要，可以为卫生政策和资金安排提供参考。在回答工作组成员 Sabelo Gumedze 提出的问题时，特别报告员回顾说，根据国际人权法，旅行限制和边境管制不应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14. 第二个专题小组讨论的重点是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法证建筑学组织研究人员 Imani Jacqueline Brown 介绍了该组织对美国警察打击“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暴行的调查结果。2020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执法人员针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人士的 1 000 多起暴力和不当行为事件被记录下来。她强调，这种压迫性应对做法是一种普遍、系统的行为模式，违反了国际基本原则和规范。她详细阐述了执法和司法机构在长期延续有罪不罚文化方面的作用，以及使受害者无法寻求补救的缺乏问责问题。她建议会员国采取措施停止使用所谓的非致命性防暴武器，并呼吁美国致力于对种族主义压迫的遗留问题进行赔偿。

15. 非裔抗争组织方案主任 Ana Barreto 就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人后裔面临的人权问题发言。她指出，对社区领袖和人权维护者的攻击急剧增加。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杀害女性、性别暴力和“政治性杀害女性”的事件增加，限制获得生殖正义服务的法律和政策也有所推进，她对此表示关切。在这方面，她建议设立多学科国家和社区机构，以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她还对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黑人移民的情况表示关切，他们居住在难民营中，获得检测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有限。

16. 民权律师 Benjamin Crump 讨论了美国警察对处于边缘地位有色人种过度使用武力的根本原因。他解释说，乔治·弗洛伊德、Breonna Taylor、Ahmaud Arbery 以及其他美国黑人的死亡不是巧合，而是自 1619 年(美国输入被奴役非洲人的第一年)以来美国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压迫的结果。他补充说，数据显示，警察对有色人种过度使用暴力，这证明了执法中的隐性偏见。例如，执法人员实施的锁喉动作超过 75%是针对有色人种男子的。他指出，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引发的反对种族主义、肤色歧视和仇外心理的全球抗议活动是政治和结构改革的

驱动力。他欢迎美国众议院通过《乔治·弗洛伊德正义和警察法》，认为这是承认历来对有色人种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压迫的第一步。

17. 在互动对话期间，Brown 女士在回答工作组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进一步阐述了为防止和打击警察对非洲人后裔的暴力和暴行而有待采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她建议美国国会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规定通过立法。她认为，会员国应将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赔偿诉求和恢复性正义上，而不是警察改革上，因为事实证明，警察改革不足以解决执法中的种族主义偏见。她补充说，财政和认知方面的补偿应解决非洲人后裔遭受的所有歧视，包括环境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种族主义。Barreto 女士指出，政策应对应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如儿童和家庭佣工。南非、欧洲联盟、巴西和比利时的代表介绍了各自国家为解决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而采取的措施。民间社会代表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黑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以及非裔厄瓜多尔人经受的环境种族主义表示关切。

18. 第三个专题小组讨论涉及的是通过补救、赔偿、问责和司法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根源。北肯塔基大学法学教授 Ursula Doyle 讨论了联合国未能解决 1877 年至 1965 年间在美国盛行的吉姆·克劳法和相关做法的问题。吉姆·克劳时代充斥着公共设施隔离、投票障碍、强迫流离失所、土地盗窃、抵债苦工、囚犯租赁、禁止“流浪”、强奸、酷刑和私刑，与《联合国宪章》的人权原则直接相抵触。她举例说明，联合国各机构未能采取行动支持非裔美国人提出的主张。尽管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国际法院都有能力处理特定国家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做法(联合国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反应就是例证)，但它们却有系统地避免动用自己的权力谴责吉姆·克劳法和相关做法。

19.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奴隶之路项目：抵抗、自由、遗产”协调员 Tabue Nguma 讨论了相对于历史的赔偿问题。他解释说，要修复几个世纪以来否认非洲人后裔的人性和历史以及非洲人后裔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这一问题，首先应撰写一部摆脱偏见的客观历史。他进一步强调，必须理解和承认奴隶制的后果通过种族主义继续支配着当今世界的构成。因此，消除结构性种族主义，为每个人(无论什么肤色)在生活的所有领域提供公平待遇，是“治愈”当前问题、集体迈向更美好未来的先决条件。他补充说，种族主义总是通过仇恨、暴力、破坏和不公表现出来，正在影响每个人，不仅是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是所有人共同努力成为有尊严的人而必须做的。

20. 在互动对话期间，工作组主席强调指出，国际法框架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当一国内部人数众多的少数群体的利益与该国在国际上所代表的多数人的利益不同时，无法处理这些群体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米哈乌·巴尔采扎克指出，补救和赔偿行动应以国际法为基础，但现有的关于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赔偿框架不足以为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作出赔偿。Doyle 女士在回答时强调，需要在国际法中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将赔偿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并解决所有国家中非洲人后裔遭受人权侵犯的问题。Nguma 先生回顾说，当前关于赔偿的辩论是自废除奴隶制以来被奴役的非洲人提出的要求的延续，他指出，即使到目前，奴隶制中显著存在的权力关系仍在支配着社会结构。他指出乔治·弗

洛伊德被害以及随后的全球抗议活动可能引发结构变革，并强调了联合国支持这一运动的重要性。

21. 第四个专题小组重点讨论了国际十年中期审查的现况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副主席韦雷纳·谢泼德介绍了 2020 年 11 月 24 日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打击执法人员种族定性行为的第 36 号一般性建议(2020 年)。她指出，执法人员的种族定性是历来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特别是非洲人后裔经常申诉的问题，并回顾说，联合国条约机构一再建议缔约国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做法。她进一步解释说，种族定性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作为一种普通执法工具是无效和适得其反的，此外还对受害的个人和社区产生负面积累效应。她介绍了在立法和政策措施、人权教育和培训、招聘措施、社区警务、分类数据、问责和人工智能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特别是，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对执法机构的种族定性事件进行有效调查，起诉、惩罚责任人，并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她着重谈到一般性建议的创新性，该建议首次论及算法定性和预测式警务的歧视性结果。她对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脸部识别及其他新技术表示担忧，这些技术可能会加深已经存在的偏见和歧视性做法。

22. 欧洲议会议员兼反种族主义和多样性小组联合主席 Pierrette Herzberger-Fofana 介绍了欧洲在反种族歧视领域的最新发展。她欢迎欧盟委员会通过其第一个反种族主义的行动计划，以及 2019 年 3 月 26 日欧洲议会通过关于欧洲的非洲人后裔基本权利的决议。她指出，目前正在讨论促进欧洲联盟机构内部多样性的倡议。她对 COVID-19 大流行对少数群体产生的过多影响表示关切，并呼吁欧洲联盟和各国政府在采取旨在减少不平等和解决贫困的行动时，更好地考虑到已知少数群体的情况。

23. 德拉萨大学讲师、非洲侨民洞察人权倡导者 John Phillip Binondo 讨论了非洲人后裔在亚太区域的处境。他解释说，虽然缺乏历史记录、承认和分类数据使非洲人后裔在这一区域被忽视，但他们面临偏见、成见和歧视，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他强调有必要建立法律架构，为边缘化群体和受害群体提供司法补救。他补充说，有必要进行教育改革，以克服固有的种族成见和对少数族裔的无意识偏见。他呼吁亚太区域会员国批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并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义务，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国际十年的活动方案。他还建议各国采取措施收集按种族和族裔分列的数据。他还呼吁非洲国家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国际十年纳入其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最后，他表示坚决支持设立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和设立非洲人后裔基金。

24. 在互动对话期间，工作组成员赞扬委员会通过第 36 号一般性建议(2020 年)，认为这对于解决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十分重要。工作组主席指出了其深远、普遍的影响。谢泼德女士在回答时解释说，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缺乏了解，主要是因为历史教训仍然不为人所知，也没有得到解决。她强调了道歉和赔偿的必要性。Binondo 先生进一步阐述了加强对于生活在亚太区域的非洲人后裔的了解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性。

25. 非洲国家组及南非的代表重申，十年中期审查以及《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对于促进非洲人后裔充分享有人权的努力至关重要。巴西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为通过一项关于促进和充分尊重非洲人后裔人权的联合国宣言草案以及设立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而进行的谈判。联合国人口基金介绍了其支持非洲人后裔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工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代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和保护少数群体网络解释了 20 个联合国实体如何致力于加强联合国内打击种族歧视、保护少数群体和反对歧视的努力。民间社会的代表讨论了歧视性做法和政策被嵌入算法、编码和数据驱动产品的风险，并表示支持设立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

五. 一年后：面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和有罪不罚现象，将非洲人后裔作为权利持有人置于核心地位

A. 否认和轻忽文化背景下的 COVID-19

26. 在疫情暴发之初，工作组报告称，在暴发 COVID-19 风险的同时，警察对非洲人后裔的暴力也在上升。[1] 工作组注意到，种族是贯穿 COVID-19、警察有罪不罚现象和全球抗议活动的“连通线”，并注意到各种密切相关的变量和考虑因素。关于可处置性和可消耗性的推定观念在历史上对种族的社会建构是必要的，但这种观念使得剥削非洲人后裔劳动、生活和知识产权的现象继续存在。这往往体现在社会推断和暗示的结合上，[2] 或者是对不确定性和前所未有的情况做出的看似自主的反应，这种反应似乎佐证了系统性种族主义，而不是体现所表达的对消除种族主义的承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对执法部门的暴力和滥用职权不受惩罚的预期、COVID-19 疫情中显露的对种族不均的无视和否认以及各国应对抗议和示威活动的种族化差异之间的共同根源和持续联系。

27. 在与 COVID-19 大流行有关的决策中对种族不均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缺乏考虑仍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工作组特别感到关切的是，疫苗接种运动的开展几乎没有考虑到种族不均和国际团结。如果不做出具体努力来对抗种族偏见，看似中立的措施和干预可能会产生歧视性结果。如上所述，非洲人后裔更容易感染 COVID-19 的根源在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系统性种族主义历来忽视非洲人后裔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障碍、慢性疾病以及作为一线工作人员的地位。

28. 在这方面，工作组讨论了分类法或分类系统如何并不中立，而是反映了种族倾向。正如工作组当时告诫的那样，“各国必须认识到特定社区需求的特殊性，否则可能会导致法律和政策不重视非洲人后裔。”[3] 这包括现有的贫困和不平等，它们

[1] 见 A/HRC/45/44。

[2] Tanaz Molapour and others, “Seven computations of the social brai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 16, No. 8 (August 2021).

[3] A/HRC/45/44，第 13-15 段。

将继续影响疫情期间的结果。[4] 在美国，2021 年 3 月，数据显示，由于 COVID-19 疫情，黑人租房者在获得和保留住房方面面临着特别的挑战。[5] 对于非洲人后裔移民来说，疫情期间服务的中断给人权和社区安全造成了障碍。[6] 2020 年，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和美洲国家组织呼吁进行改革和选民重新登记，因为圭亚那的私人顾问利用种族陈规定型观念和隐喻在选举周期形成了一个多议题的反黑人共识，类似于几年前剑桥分析公司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造成的影响。[7] 然而，未能解决对非洲人后裔作为一个群体的不同影响的情况依然存在，即使各国注意到忽视或否认种族普遍影响的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是如此。

29. 这在不同背景下都有所发生。在西班牙，由于身体特征，非洲人后裔在获得适当住房和教育方面受到最严重的歧视，这一现实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继续存在或恶化。[8] 哥伦比亚民间社会报告说，非洲人后裔社区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难以用得上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情况，加剧了对 COVID-19 的担忧和执法机关权力的滥用。除了 COVID-19 的死亡率高出 25%外，三分之一的非裔哥伦比亚人在享受人权方面遇到严重障碍，这一数字比一般人口高出 50%。2021 年 4 月开始的一场由税收提案引发的全国罢工被认为是这些持续被忽视的担忧的直接结果。事件中心卡利市拥有拉丁美洲第二大非洲人后裔人口，自罢工开始以来，该市经历了最多的警察暴力事件，也是警察杀害非洲人后裔最多的城市。[9] 自罢工开始以来，哥伦比亚据报已发生数千起暴力事件，包括死亡、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10] 在卡利，与警察有关的死亡事件的受害者中有 36%是非洲人后裔，其中 62%的死亡者是非洲人后裔。哥伦比亚的另一个民间社会组织记录了超过 82 名非洲人后裔妇女被强迫失踪、任意拘留和谋杀的事件。[11]

30. 在印度洋地区，非洲人后裔最初缺乏个人防护装备，最近又面临接种疫苗的挑战。此外，整个期间，包括登革热在内的相互竞争的医疗卫生危机一直在与 COVID-19 竞争，导致之前由政府官员提供的登革热预防服务被关闭，居民在多个方面面临风险。设备不足或过期的卫生工作者描述说，他们一直都是在顶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操作。此外，依赖国际项目和方案获得收入的艺术家经受了严重的收入损失。

---

[4] 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018 年，留尼汪岛 40%的人口(主要是非洲人后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5] 更多信息，见 www.childtrends.org/publications/racism-and-discrimination-contribute-to-housing-instability-for-black-families-during-the-pandemic。

[6] 有关非洲裔移民面临的挑战的更多信息，见 https://g2re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Mapping-of-challenges-in-lawful-residence.pdf。

[7] *The Great Hack* (2019).

[8] 更多信息，见 www.infomigrants.net/en/post/29866/report-discrimination-worsens-in-spain。

[9] 更多信息，见人权和流离失所问题咨询机构 2021 年的报告，可查阅 https://codhes.wordpress.com/2021/07/01/presentamos-manual-de-autoproteccion-para-lideres-y-lideresas-sociales/。

[10] Temblores ONG，2021 年 6 月 16 日公报。可查阅 www.temblores.org/comunicados。

[11]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Racism/WGEAPD/urgency-of-now/csos/ILEX-Accion-juridica.pdf。

31. 在整个疫情期间，对尊严和人性的尊重也受到了损害。对在线论坛的更多依赖增加了人们熟悉的虐待和骚扰。在联合王国，疫情期间关于黑人妇女和非二元性别者受到网络虐待报告有所增加。[12] 另一些则报告了“次等概念”如何使非洲人后裔被当局视为幼稚，特别是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在这方面，他们被剥夺了公共资源和服务，关切和问询被视为不遵守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

32. 非洲人后裔还报告说，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人们期望他们始终可以工作。对于回家的学生来说，要为大学或中学远程学习保持可靠的互联网连接，以及缺乏面对面的支持，导致辍学率上升。对许多人来说，随着不安全感的升级，对家里可用的互联网的需求导致了巨大的支出。粮食不安全加剧也是普遍报告的情况，同样的还有该需求不为人所知的情况。在哥伦比亚，80%以上的非裔哥伦比亚人依赖非正规经济，而这种经济因缺乏旅行和旅游业减少而遭受重创。近 40%的人将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到一天两餐或更少。在其他地方，各社区也报告团结程度下降，不信任程度增加，因为对避免感染的担忧限制或阻止了现有的基于社区的干预措施，使人们对共享卫生和其他资源感到担忧，并导致互助努力复杂化。这被称为文化偷窃，因为团结文化的一些核心方面变成了潜在的威胁。在疫情期间，恐惧、冷漠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使社区陷入瘫痪。这包括对警察的恐惧，以及对可能产生风险的长期丧葬文化习俗的恐惧，例如在离世亲人家的门槛上擦肩，这是印度洋地区非洲人后裔的习俗。

33. 令人熟悉的不平等现象继续推动着全球 COVID-19 应对工作：在获得疫苗方面财富和地缘政治力量凌驾于需求、风险和国际礼让之上。疫苗生产商试图主张知识产权，这可能会限制疫苗在全球的复制和推广。此外，即使在富裕国家，争夺疫苗的竞标战也极大地影响了疫苗的供应，导致一些国家疫苗被销毁或过期，而另一些国家则很少或根本无法获得疫苗。在欧盟，一些国家允许普遍接种疫苗，但在另一些国家(如希腊)，非洲裔移民如果没有国民身份号码，就无法接种疫苗。[13]

34. 出现了种族化的、基于财富的双重标准，富裕、发达国家的公民享有广泛的疫苗使用机会。而在其他国家，获得疫苗的机会仍然很低或不存在，COVID-19 的威胁持续存在，同时还有非疫苗干预措施，包括试图减轻感染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治疗。[14] 无法获得疫苗并不一定与是否有疫苗供应有关。即使在目前，南非生产的数百万剂疫苗也被运往欧洲分发。[15] 据报道，非洲疫苗购置信托基金通过威胁阻止疫苗针剂出口来为非洲人谈判获得疫苗。疫苗民族主义，包括最富裕国家的

[12] Glitch UK and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alition, “The ripple effect: COVID-19 and the epidemic of online abuse”, Septem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glitchcharity.co.uk/wp-content/uploads/2021/04/Glitch-The-Ripple-Effect-Report-COVID-19-online-abuse.pdf.

[13] Generation 2.0, “Operation freedom or health insecurity?”, 6 Jul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g2red.org/operation-freedom-or-health-insecurity/.

[14] ISGlobal, “Recruitment begins in Mozambique for ANTICOV clinical trial of early treatments for COVID-19”, 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 29 July 2021.

[15] Gordon Brown, “The world is making billions of COVID vaccine doses, so why is Africa not getting them?” *The Guardian*, 16 August 2021.

民族主义，以及“疫苗种族隔离”表明，力量均势将继续对 COVID-19 的治疗、获取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35. 由于历史上一直没有政治意愿来纠正和修复殖民主义以及非洲奴隶贸易和贩运造成的持续伤害，COVID-19 大流行对非洲人后裔来说更加严重。2021 年 5 月，研究人员证实，财政赔偿本可使 COVID-19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个疫情非常严重的地区)的传播减少 31-68%。[16] 系统性种族主义所造成的种族不均明显地加剧了 COVID-19 大流行对黑人社区的破坏。

36. 对是否接种疫苗迟疑不决等因素，也导致了能获得疫苗的非洲人后裔接种率较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西方的接种科学起源于非洲人后裔的知识产权，[17] 但在目前疫苗普遍可用的一些国家，非洲人后裔的接种率过低。不信任的基础，包括系统地使用黑人身体进行医学实验，[18] 为系统性种族主义如何改变文化习俗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

37. 在疫情期间，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无视交叉问题的情况。例如，在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据报为减少街上人数而实施的活动限制有时是根据性别来规定在哪些日子活动，而没有考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使跨性别者处于特别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对于本已面临警察过度关注和滥用职权的非裔哥伦比亚人来说更加严重。在联合王国，网上虐待和骚扰在疫情期间有所增加，特别是对于黑人妇女和非二元性别者。

B.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警察针对非洲人后裔的暴力行为

38. COVID-19 疫情肆虐，风险加剧。尽管如此，在一些国家，非洲人后裔开始遭遇警察拦截和执法暴力，其比率令人震惊。在 COVID-19 危机期间，对黑人团体和社区的警务工作有所加强、有时甚至达到滥用程度，其中包括对非洲裔儿童定罪，这种情况对社区和家庭产生了有害影响，助长了对执法的不信任。[19]

39. 人权机构报告称，在若干国家，在因 COVID-19 疫情而强制执行的封锁、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期间，暴力事件有所增加。据报，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联合王国和美国，针对非洲人后裔或在非洲人后裔社区高度集中的地区发生了更严重的种族定性、警察暴力、非法使用武力和滥用职权事件。在加拿大多伦多，2020 年一份关于多伦多警察局对黑人种族定性和种族歧视的报告发现，在与警察的各种接触中，黑人更有可能遭到主动抓捕、指控和武力对待，报告确认黑人社区承

[16] Eugene T. Richardson and others, “Reparations for Black American descendants of persons enslaved in the U.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 on SARS-CoV-2 transmiss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276, May 2021.

[17] Carey Baraka, “Onesimus: the African slave who taught America how to vaccinate itself from smallpox”, *Quartz*, 10 May 2020.

[18] A/HRC/45/44，第 53-56 段。

[19] A/HRC/45/44.

受了过多的执法负担，其方式与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反黑人种族偏见是一致的。[20] 墨西哥的非洲裔移民报告了移民官员和警察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服务和住宿方面(包括在获得住房、就业和教育机会方面)的种族主义。[21]

40. 在哥伦比亚，民间社会组织报告称，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警务工作被用作向非洲人后裔和社区灌输恐惧以及贬低或控制他们的一种机制。[22] 他们评估了基于皮肤颜色和色泽的严重种族定性，发现在与警察的接触中，非洲人后裔被罚款的可能性是处境相似的非黑人的 2-14 倍。民间社会还报告称，公开使用拦截和逮捕配额使青年和其他人面临缺乏充分理由的警察行为升级。此外，哥伦比亚警察的分散性质导致对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隐瞒许多滥用职权的行为。有人提供证词，报告脱衣搜查等骚扰行为、被要求做俯卧撑以及警察在例行拦截和逮捕中实施的性侵犯行为。在押青年报告了以强迫劳动换取释放的情况。多名警察自己承认对非洲人后裔有种族成见、将其视为异类、使用动物化和令人反感的种族隐喻，公开承认这些做法导致他们更频繁地使用武力，并承认自己觉得应该保护社区不受非洲人后裔的伤害，而不是将非洲裔哥伦比亚人视为自己社区的一部分。

41. 执法人员使用的技巧有时会将抗议者置于危险之中，包括过去与警察滥用职权有关的包围和挤压示威者(“围堵”)。在纽约市，非洲人后裔在 COVID-19 期间遭遇警察暴力，随着示威活动的开始，暴力事件在继续。培训文件指示把自行车用作大规模示威活动中赢得服从的“战力倍增手段”。[23]

C. 种族不均和警察不受惩罚背景下的抗议、公众意识和全球变革要求

42. 去年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催化了改革和调查，2021 年要求各国正视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民众抗议和全球呼声在继续。对许多人而言，乔治·弗洛伊德和其他人被谋杀、长期以来警察不受惩罚、否认文化等已经站不住脚。许多抗议者要求削减警察经费或者重新分配公共资源，不再把公共资源用于监禁和以武力解决问题。此外，终止或减少使用旨在保护警察免于承担不当行为民事责任的有条件豁免仍然是抗议者的核心要求。[24]

43. 这些对公平、平等和变革的要求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有人在努力妥协或破坏这些要求。在一些种族正义抗议活动中，发现流氓钻营者或白人民族主义煽动

[20] 安大略人权委员会，*A Disparate Impact: Second Interim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Racial Profiling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of Black Persons by the Toronto Police Service* (安大略，2020 年)。

[21] S. Priya Morley, “Reckoning with racism against Black migrants in Mexico”, Open Global Rights, 16 February 2021.

[22] 根据 ILEX(哥伦比亚)2021 年 5 月提交的民间社会呈件。

[23] John Bolger and Alice Speri, “NYPD ‘goon squad’ manual teaches officers to violate protesters’ rights”, The Intercept, 7 April 2021.

[24]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加强执法诚信法案》(SB20-217)(2020 年))和新墨西哥州(《民权法案》(HB 4)(2021 年))是最早有效禁止有条件豁免的两个州。纽约市似乎准备成为第一个严格限制有条件豁免的城市(见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york-city-moves-end-qualified-immunity-making-1st/story?id=76752098)。

者是暴力和财产破坏行为的幕后黑手。[25] 在一些国家，一些公职人员已经采取行动惩罚或压制和平抗议的权利。在美国，针对抗议活动通过了几项法律，其措辞宽泛到已可实际侵犯和平集会和抗议权。[26] 在法国，一项综合安全法案力求应对“黄马甲”等平民抗议活动，该法案广泛允许压制非洲人后裔的和平集会和抗议活动，包括禁止散布警察参与公开不端行为的图像；增强面部识别技术；增加私营警务工作；解散合法捍卫人权的社团；打击非政府组织资金筹措。在哥伦比亚，催泪瓦斯和防暴治安措施的使用给许多人留下了持续和长期的伤害，并加剧了社会的恐惧和不信任。加上疫情被用作限制行动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依据，疫情期间风险最高的人同时面临着最粗暴的践踏人权行为。

44. 此外，在一些国家，民间社会和当地社区大肆报道警察对非洲人后裔的严重暴力事件，但广泛的信息和提高认识活动并不总是能增进公众对这些国家系统性种族主义驱动因素和遗留问题的了解。例如，尽管提高认识抗议活动强调阿达马·特拉奥雷和其他人死于警察之手，但在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警察中的种族主义并不比其他职业界多，公众对警察的信心仍然很高，只有18%的受访者认为警察中的种族主义比其他职业更多。[27] 虽然这个数字在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人中几乎翻了一番，但这个数据点可能反映的是公众舆论如何抵制而不是承认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在缺乏充分的相关分类数据来说明非洲人后裔现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45. 扩大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叙述也没有对警务工作以外的决策产生必然的影响。2021 年 3 月，伦敦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抗议一项针对非洲人发型的禁令，该禁令声称，非洲人后裔的天然头发会不适当地挡住班里其他学生的视线。[28] 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要求立法允许非洲人后裔在工作场所留自然发型。

---

[25] Neil MacFarquhar, “Many claim extremists are sparking protest violence. But which extremists?”, 《纽约时报》, 2020 年 6 月 22 日；Mia Bloom, “Far-right infiltrators and agitators in George Floyd protests: indicators of white supremacists”, Just Security, 30 May 2020。

[26] 例如，在美国，见佛罗里达州 HB 1/SB 484(2021 年)(扩大了“暴乱”的定义，规定了对示威者的新处罚)；俄克拉荷马州 HB 1674(2021 年)(处罚阻碍交通的抗议者、殴打抗议者的司机不受惩罚、与抗议者合作的组织承担责任)；田纳西州 SB 0902(2019 年)(规定了对阻碍交通示威者的新处罚)和 HB 8005/SB 8005(2020 年)(加大了对“带来不便的”抗议的处罚，根据该规定，阻碍使用街道或人行道或给街道或人行道的使用带来“不合理的不便”的示威者可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北达科他州 HB 1304(2020 年)(规定对那些在实施犯罪行为(如乱穿马路)时用口罩、头巾或其他装置“隐藏”个人面部“任何部分”以避免被识别或辨认的示威者实施新的处罚)；西弗吉尼亚州 HB 4618 (2018 年)(解除警察对在驱散暴乱和非法集会时造成人员死亡的责任；如果要求旁观者协助驱散工作但旁观者没有这样做，他或她“应被视为暴徒”)；犹他州 SB 173(2020 年)(对扰乱立法或其他政府会议的抗议活动给予刑事处罚；将“不检行为”的范围扩大至肆意通过在官方会议上可听到的“不合理噪音”给公众造成不便、阻碍行人交通、或在执法者要求其离开官方会议时拒绝这样做)。见 www.icnl.org/usprotestlawtracker/?location=&status=enacted&issue=&date=&type=。

[27] Guillaume Farde and Floriane Labarussiat, “La confiance police-population en 2021: le décrochage des 18-24 ans”, note de recherche, Baromètre de la confiance politique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 2021 年)。可查阅 www.sciencespo.fr/cevipof/sites/sciencespo.fr.cevipof/files/NoteBaroV12_GF%26FL_confiancepolice_mars2021_Versionfinale2.pdf。

[28] 英国广播公司，“Pimlico Academy pupils stage protest over ‘racist’ uniform policy”，2021 年 3 月 31 日。

46. 民众抗议、刑事程序或全球呼声也未能系统性地改革警务工作。在美国，2021 年前 5 个月有 89 名非洲人后裔被警方杀害，其中包括十几岁的马基娅·布莱恩特、20 岁的丹特·赖特和 42 岁的小安德鲁·布朗。[29] 根据《警察暴力摸底调查》，黑人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三倍，在被警察杀害时更有可能手无寸铁，更不可能威胁到别人。[30] 在法国，独立机构“权利捍卫者”的一项调查显示，非洲裔青年男子被拦截和搜查的可能性比其他任何男性群体高 20 倍。[31] 在澳大利亚，2021 年 3 月，非洲裔青年(特别是南苏丹人)占在押青年的 19%，这一比例与他们在该国的人数特别不成比例。[32]

D. 2021 年联合国、国家和民间社会等方面新兴的重要领导力

47. 2021 年，在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内部，领导层根据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的要求采取了重要步骤，应对和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工作组强烈赞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的关于促进和保护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人权和基本自由、使其免受执法人员实施的过度使用武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侵害的报告(A/HRC/47/53)，并赞扬在整个报告起草过程中卓有成效的合作。2021 年 7 月，人权理事会通过第 47/21 号决议，为各国执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中的建议提供指导和鼓励，包括建立一个新的专家机制，重点关注执法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2021 年 8 月，大会设立了非洲人后裔问题常设论坛，这是一个专家协商论坛，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领导和关注与非洲人后裔有关的紧迫问题。

48. 一些政府间组织和会员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重新构想了与警察暴力侵害非洲人后裔有关的制度。在美国，2021 年 4 月，明尼苏达州的一个陪审团判定前警官德里克·肖文因在 2020 年 5 月杀害乔治·弗洛伊德而犯有二级谋杀罪。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的一项历史性裁决中，美洲人权法院在 *Acosta Martínez y otros* 诉阿根廷一案中做出了对阿根廷不利的裁决，指出该案是“迫害和污名化非洲裔群体的典范”，敦促该国有系统地就非洲人后裔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培训安全人员，并要求该国公开报告拘留非洲人后裔的情况。

49. 在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中期审查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到来之前，工作组在其第二十六届会议上与民间社会举行了五次区域协商，[33] 并收集了民间社会、会员国和国际组织为响应就国际十年中期审查(2020 年 1 月)和非

[29] Nolan D. McCaskill, “Police are still killing people at the same rate as before”, Politico, 25 May 2021.

[30] Andrew R. Chow, “People expected police behavior to change after George Floyd’s murder. The numbers tell a different story”, 《时代周刊》，2021 年 5 月 13 日。可查阅 https://time.com/6046645/police-killings-2021/。

[31] Dunja Mijatovic, “Opinion: Europe must wake up to racism, Afrophobia”，德意志电波电台，2021 年 3 月 21 日。

[32] Stephane Shepherd, “Opinion: too many young African-Australians are in jail. Some blame police, but the data tells a more complex story”，ABC 新闻，2021 年 3 月 25 日。

[33] 见 www.ohchr.org/EN/Issues/Racism/WGAfricanDescent/Pages/Session26.aspx。

洲人后裔当前人权状况(2021 年 6 月)提供意见的两次呼吁而提供的书面意见。[34] 八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正式启动了国际十年，[35] 多个国家为非洲人后裔采取了立法和政策措施。

50. 在加拿大，黑人议会核心小组建议政府解决助长对非洲人后裔歧视的系统性障碍，包括为黑人拥有的企业或黑人企业家的初创企业或现有的营利性小企业提供最高可达 25 万加元的资助，[36] 力求释放难以获得资助的非洲裔加拿大人的潜力。在突尼斯，通过了第 2021-203 号法令，成立了全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国家成立了一个机构，研究公共政策决策如何影响非洲人后裔。

51. 在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工作组宣布，欧洲联盟将通过 2020-2025 年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37] 美国将在 2021 年启动“与我们所面临机遇和挑战的规模相匹配的全政府公平议程”。[38] 工作组还欢迎地方、国家和区域为寻求真相和有限形式的赔偿所采取的举措，例如“加共体 10 点赔偿计划”，公共空间、教科书和国家记忆的去殖民化，归还非洲文化遗产，承认对非洲人后裔犯下的历史暴行并为此道歉、提起诉讼。

52. 个人、社区和民间社会的努力也为各行各业承认并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提供了领导作用。民间社会在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间社会团体在全球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2021 年，除其他外，民间社会行动促使会员国意识到这个问题，敦促采取历史性的果断行动，并在去年和之前的关键时刻在国家、国际和政府间进程中充当旗手。

53. 此外，职业运动员和一些体育组织还发挥了特别领导作用。在科林·卡佩尼克的积极活动下，体育赛事前播放国歌时“单膝下跪”的做法再次兴起。卡佩尼克的美国橄榄球生涯因这一引人注目的平等诉求而丧失，但在国际范围内，这种做法已得到足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的采纳。在美国，全国女子篮球协会已将争取社会正义作为其公共场合活动的核心，包括宣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活动和服装。

---

[34] 所有书面意见可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Racism/WGAfricanDescent/Pages/urgency-of-now.aspx。

[35] 有关各国采取行动的汇编，可查询全球传播部维护的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网站(www.un.org/en/observances/decade-people-african-descent/actions-taken)和人权高专办维护的在线反歧视数据库(https://adsdatabase.ohchr.org/SitePages/Anti-discrimination%20database.aspx)。

[36] 加拿大通讯社，“Federal Government launches loan program for Black-owned businesses”, Todayville, 31 May 2021。可查阅 www.todayville.com/federal-government-launches-loan-program-for-black-owned-businesses/。

[37] 可查阅 https://ec.europa.eu/info/policies/justice-and-fundamental-rights/combatting-discrimination/racism-and-xenophobia/eu-anti-racism-action-plan-2020-2025_en。

[38] 见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0/executive-order-advancing-racial-equity-and-support-for-underserved-communities-through-the-federal-government/。

E. 持续的关注：“如果不把我们考虑在内，我们就不参与”

54. 多个国家已将这些群体自身认同的类别纳入国家人口普查；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则对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调查。[39] 在有数据的情况下，它们有助于突出和解决体制上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均。而缺乏按种族分列的数据是掩盖非洲人后裔面临的系统性歧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已经彰显，疫情期间几乎没有国家立即公布按种族分列的数据。即使是传统上一直保存按种族分列的数据或在行政数据中方便进行种族自我认同的国家，也没有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立即维护或披露基于种族的数据，而是往往完全拒绝这样做或者最终同意民间社会的要求。考虑到事实几乎立即证明疫情将会而且已经对全世界的非洲人后裔造成尤其严重的影响，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

55. 因此，在一些国家，缺乏分类数据和政治意愿导致难以确保发展和改革努力惠及非洲人后裔。例如，在阿根廷，移民人口以外的非裔阿根廷人的发展因其缺席政治话语以及缺乏按种族分列的相关数据而受到影响。

六. 结论和建议

56. 工作组感谢会员国、国际组织代表和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工作组还感谢特邀发言嘉宾的发言和分析。

A. 结论

57. 尽管有各种对平等的承诺，但长期以来非洲人后裔一直受到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因此，需要采取紧急集体行动有效解决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受惩罚现象的根源。尽管发展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但非洲人后裔在全世界面临共同挑战，包括种族主义和结构性歧视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排斥、边缘化和不公正。虽然这些显然是跨大西洋贩卖非洲人和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但也反映了当今仍在持续的思维模式和对不受惩罚现象的普遍利用和期许。

58. 非洲人后裔的社会地位也使其遭受多种交叉形式的系统性压迫。建立在歧视性惯例基础上的制度按照种族界限有系统地分配资源、权力和机会，影响了非洲人后裔充分、自由参与社会、治理和经济的能力。这也意味着非洲人后裔容易感染 COVID-19。COVID-19 大流行对非洲人后裔造成了尤其严重的灾难性影响，包括疫情死亡人数和负面健康影响方面的种族不均以及随着时间推移造成的社会经济代价。

59. 在此期间，人们还特别强烈地认识到全球范围内警察对非洲人后裔的暴力行为。民众抗议遭遇国家暴力。有关暴行和暴力事件的视频证据已汇总在一起，其中包括使用催泪瓦斯和辣椒喷雾剂、任意逮捕、拘留和恐吓、用警棍、枪托或车辆进行身体攻击、袭击记者或法律观察员、用“围堵”防止平民离开抗议地点、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

[39] 关于种族正义数据的更多信息，见 A/HRC/42/59。

60. 收集按种族、民族等分类的 COVID-19 相关感染和死亡数据应能为制定抗疫对策提供信息。

61. 和平示威者和民间社会倡导者、包括支持广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跨国运动的人遭遇国家的暴力回应，而民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却得到国家行为体的姑息和非暴力对待，哪怕在面临暴力和财产破坏的情况下。

62. 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仍然是全球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案件是源于错误地使用束缚措施或者源于恰恰需要进行精神健康干预而不是警察干预的情况。

63. 各种形式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在全球持续存在。它们与健康不公平的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人权涉及知情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平等和不歧视权以及身体自主权等其他人权，并与这些其他人权相互交叉。

64. COVID-19 揭示了结束全球卫生架构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紧迫性，这些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黑人和土著群体以及有色人种群体和全球南方各群体产生了尤其严重的影响。在世界许多地方，与实现健康权有关的挑战根源于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隔离、仇外心理、排非主义、跨性别恐惧、同性恋恐惧以及残障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因此，任何减少结构性健康不公平的努力都必须挑战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并赋予个人和团体权能，使其能够有力有效地倡导自己的权利。若想真正结束 COVID-19 大流行，必须在全世界每个国家为每一个人消灭疫情。

65. 尽管过去几十年在卫生保健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种族化的健康不公平现象深刻而持久。研究表明，与日常种族主义相处的长期压力导致过早衰老(即“老化效应”)。此外，在缺乏按种族分类数据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辨别。例如，更新非洲人后裔高血压治疗方案花了很多年时间，只是在有了分类数据后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66. 非洲人后裔对医疗保健系统的不信任是被忽视、虐待和剥削长达几个世纪的遗留问题以及当前明显的偏见、不平等、不公平和歧视带来的结果。

67. 研究显示，医务工作者表现出种族偏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尤其会表现出来，其结果是对白人患者的态度相对积极，而对黑人患者的态度比较负面。

68. 用于医疗创新的技术中的数字监测、监控和面部识别可能会导致种族主义永久化，从而导致种族主义被内置到医疗技术中。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情况会在医疗保健的诊断、调查、分析和算法方面带来不公正的结果。一个例子是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广泛使用的一种算法，该算法基于种族，大大低估了患有最多慢性病的黑人患者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治疗方面的种族健康不公平。

69. 在疫情期间，针对人权维护者的袭击、特别是针对非洲人后裔的袭击有所增加。倡导生殖健康、性教育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权利的妇女成为袭击目标并受到死亡威胁。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针对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的暴力行为正在上升。考虑到 70%的黑人人口依赖公共卫生系统，这种情况更是糟糕。COVID-19 疫情对处境脆弱的人产生了尤其严重

的影响，加深了先前存在的不平等。各国有责任展现政治领导力，优先考虑尊严，并将基于人权的方法应用于所有行动。

70. 必须记录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斗争历史，包括联合国机构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例如，在 1945 至 1965 年间，国际法院没有就吉姆·克劳法事宜提出咨询意见，这与法院就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提出的咨询意见形成鲜明对比。同样，联合国拒绝受理美国非洲人后裔提出的权利主张，表明联合国系统在处理有别于民族身份的种族问题上面临着挑战。

71. 赔偿是一项国际公认的人权，然而因贸易和贩运被奴役的非洲人以及殖民主义而对非洲人后裔进行赔偿仍然是许多论坛上一个有争议的讨论话题。许多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很大程度上误解和(或)拒绝了与赔偿非洲人后裔有关的合法期望和要求。

72. 人权理事会的紧急辩论、理事会第 43/1 号决议、高级专员的报告(A/HRC/47/53)和理事会第 47/21 号决议为在当地落实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承诺提供了明确和重要的指导。工作组将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合作，继续支持人权理事会和人权高专办执行该决议。

73.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国际十年中期审查和《2030 年议程》是确保种族平等和公平始终位于全球议程和国家议程核心的重要平台。

74. 工作组欢迎重新启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和保护少数群体网络，包括高层的参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必须本着秘书长呼吁采取行动的精神，把打击种族主义作为集体优先事项来抓。

B. 建议

75. 工作组赞赏地注意到在本届会议发言中提出并提交给工作组的许多建议。[40] 工作组提出以下建议。

76. 会员国必须致力于种族平等和正义，并致力于结束针对非洲人后裔的暴力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有必要对过去进行诚实的评估，包括承认并解决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造成的后果。

77. 会员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承认、解决和缓解广泛存在的、种族化的健康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对与 COVID-19 和其他大流行病相关的医疗标准和风险都产生影响。

78. 工作组大力鼓励会员国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适当考虑高级专员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迅速执行其中和随后的人权理事会决议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40] 提交的建议可在工作组的网页上查阅(www.ohchr.org/EN/Issues/Racism/WGAfricanDescent/Pages/Session27.aspx)。

79. 政府间、政府和地方规程必须确保任何成功的 COVID-19 疫苗必须在不同国家和任何特定国家的不同群体中公平分配。必须特别小心，确保在疫苗推出过程中不会加剧疫情带来的不平等。

80. COVID-19 疫苗相关科学生产中的新技术和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广泛分享。各国有义务确保 COVID-19 疫苗和治疗药物得到公平分配，确保以安全、可供、可及和负担得起的方式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疫苗和治疗药物。

81. 按种族分列的各方面疫情数据对于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为卫生政策、资金筹措和更广泛的政策举措提供信息至关重要。各国和民间社会应与非洲人后裔合作，开展具体努力，在所有部门收集、分析和公开报告按种族分列的数据。

82. 在全球疫情期间，卫生专业人员一直至关重要。随着与疫情相关的创伤和压力不断增加，公共和私人资源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支持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必要的应急响应人员，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忙于治疗和预防 COVID-19，同时还要照顾家庭和亲人，往往还要同时处理个人的不安全感和长期的种族压力。

83. 各国和民间社会应制定关于 COVID-19 大流行影响的具体指标，并因地制宜调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确保发展和人道主义努力惠及各个部门的非洲人后裔。

84. 在许多非洲人后裔社区，由于地理和文化条件限制了前往医院和保健中心的机会，传统医护人员(助产士、传统治疗师和医生)一直是获得医疗服务和咨询的唯一途径。然而，传统治疗师和助产士与生物医学卫生系统的关系常常较为紧张。作为当务之急，各国应投资于对传统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相关培训和资源配置，使其成为事实上的 COVID-19 应急响应人员。

85. 各国应倡导跨文化方法，利用祖传知识和传统药物，在 COVID-19 大流行框架内扩大公共政策并与之实现协同。考虑到许多非洲人后裔社区的地理现实，各国同样应支持监测疫情的社区举措。

86. 各国应确保在农村社区以及非洲人后裔缺乏卫生基础设施的社区增加重症监护、呼吸机和其他设备等医院资源。

87. 各国应根据《欧洲人权公约》对何时可以实施拘留作出具体规定，以确保任意逮捕不会对非洲人后裔造成尤其严重的影响。

88. 各国应停止使用滋长逮捕、配额和滥用权力现象、对非洲人后裔影响尤其严重而且经常侵犯人权的私营监狱、警察和盈利模式。

89. 各国必须以适当比例投资于医疗保健、住房、精神健康服务和其他公共产品、服务和住宿，并停止将刑事法律系统用作提供通盘服务和解决问题的场所。

90. 各国必须明确承认并阐明打击大规模监禁的意图，将其作为对抗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一种机制，并在赔偿性和恢复性决策和政策讨论中正视其对非洲人后裔的影响。

91. 各国应消除公开录制或传播执法行为视频的法律障碍。

92. 各国必须按照基于人权的数据收集方法，收集、汇编、分析、传播和公布按种族和民族分列的可靠统计数据。各国应采取并支持种族不均情况审计、观察站和研究等其他措施，以更好地了解种族不均情况并为与非洲人后裔获得平等和机会有关的决策提供信息。

93. 各国必须通过提供财政支持和为查阅记录、档案和原始数据提供便利，以及努力审查和修订教科书和课程，来促进编撰和传播关于非洲人后裔历史贡献以及奴役和殖民主义时期的知识。

94. 必须支持民间社会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谴责和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努力和举措，特别是通过资助和公开承认给予支持。各国必须切实保护那些挺身而出反对种族主义的人(包括人权维护者)免受恐吓、监视、报复、骚扰和攻击。

95. 各国应加强对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目标和优先事项的参与。十年中期审查为会员国提供了承诺解决种族不公正问题的机会。

96. 工作组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全面有效地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并毫不拖延地制定和执行全面的国家行动计划，通过加强国家体制、立法、司法和设立国家主管机构来充分调查有关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或相关不容忍行为的指控，从而解决种族主义问题。

97. 种族主义、结构性歧视、排非主义和相关不容忍现象无处不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构成严重挑战。工作组提醒会员国，消除结构性歧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驱动因素，需要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非洲人后裔面临的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工作组建议，其关于将非洲人后裔纳入《2030 年议程》的业务准则应为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按照《2030 年议程》开展的工作提供参考。

98. 工作组敦促各国签署和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贯彻执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过去提出的影响所有移民的各项建议。

99. 工作组还敦促《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缔约国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并敦促非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批准该公约。